

[50周年]
[纪念版]
1962~2012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张素华 著



[50周年]
[纪念版]
1962~2012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张素华 著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纪念版张素华著. —3版.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53-0487-8

I. ①变…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62

IV. ①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861号

责任编辑：吴晓梅

封面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部：(010) 57350521

门市部：(010) 57350370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8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7年8月北京第2版

2009年11月北京第3版 2012年1月北京第4版

印 次：2012年1月北京第11次印刷

印 数：78001—86000册

定 价：4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

(代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以至于研究历史的人，索性把这个会议叫作“七千人大会”，它的正式名称，反倒有些陌生。

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与会者的心态和讨论发言情况如何？最后形成了什么共识，做出了什么决策，解决了哪些问题？这样开会，对后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难。若要理清来龙去脉，拎出会议的要害关键，还原当时的政治气氛，道出中央领导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过程，揭示当时情况下执政党的决策方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对三年“大跃进”的探索实践及其主题的准确把握，缺少对中央领导层当时的决策过程的仔细研究，不挖掘和积累大量详实的会议材料，特别是会议的酝酿细节和与会人员的发言内容，实难做到。《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我觉得是大体做到了的。

作者张素华，是我的同事。她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中央文献研究室，那时还叫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很单纯，就是通过编辑党的重要文献，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一晃达30余年，《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她的第一部个人著述。积几十年之功，成一部史作，在当代学术史上，已不多见，其在史识和材料上的扎实程度，也可想而知。唯其如此，2006年该书一面世，即引来不小反响。一部靠材料说话的严肃史作，竟成为了畅销书。如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根据读者需要，推出这部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的新版。

我是在2006年细读该书的。当时感受颇多，对书中描述的七千人大会的开法，犹有兴趣。现尝试作以下疏理。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不仅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史的史册，更以其通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决现实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聘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泽东的设想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道理，把会议当成“小整风”。于是，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里明确提出：会议主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观点和作风就是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

因落实粮食征购计划而引发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来总结经验，体现了中央见微知著的正确判断和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当然，这也不是灵机一动所致。此前在调整和制订经济计划时，即已出现中央的指示落实不畅的情况，不少地区和部门强调局部利益，向中央讲条件，并觉得前几年的工作不够理想，中央也没有作统一和明确的解释。因此，召开“七千人大会”实为形势使然。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无论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还是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举不举，怎样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从1963年到1972年的远景规划设想的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拟报告稿是否要推翻重来这些问题，都提了出来。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会者把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和深入了。

例如，原拟报告强调“大跃进”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原则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分组讨论时，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有人说，如果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就不能解释有的省

区的失误特别严重，而有的省区则相对轻一些，有些稳重的省区甚至粮食也没怎么减产，可见，这与各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作风是有关系的。有人说，前几年人们对上面要求的经济高指标，有的确实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随大流将信将疑，有的是认为指标高一点便于鼓干劲、动员群众，这三种情况确实与经验不足有关。但还有两种情况就不能说是缺乏经验了：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高指标，但是不敢说出来，一种是明知不行，却硬说能够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这两种情况显然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这样的议论，便直接触及到党内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了。

再如，与会者认为，中央强调多做调查研究，这是对的，但同时要解决怎样调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1958年，上自中央领导人，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国务院很多部的部长也都下去了，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的工作并不缺乏下去搞调查研究。问题是虽然下去了，却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即使看到、听到了，回来后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结果，调查研究表面上轰轰烈烈却缺少实效。这样一来，失误的关键又归结到政治生活是否有民主气氛的问题上来了。在分组讨论中，几乎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谈到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有人还说当时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的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如果按这样的“四不讲”来搞调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面无而实际有的情况，听不到人们口中无而心中有的声音，自然也就提不出各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观点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报告的第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刘少奇1月27日还针对讨论情况在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关于中央吸收大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这个讲话，是对会议讨论情况的真切回应。其中心意思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让群众讲话，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有了错

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毛泽东还专门讲了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刘邦“从谏如流”而项羽“主观武断”的故事，说明“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又一次带头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个建议，显然有利于落实会议的认识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心里的疙瘩还是难以化解，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结合本地的实际，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得更具体、更深入一些。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日的会议，便以“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区、部委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对引发这次大会的粮食征购问题则不再纠缠，中央还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征购任务，反对分散主义也逐渐淡出了会议的主题。这些做法，使与会者心平气顺，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正贯彻。

民主气氛活跃了，大家的心气就顺了，认识也就统一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落实到克服困难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就曾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形成和实施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精减城市人口等，都属于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完善政策并贯彻于实践的重要之举。

一次为解决粮食征购难题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转

变和提升，自是可圈可点。今天的人们已不再面临当时讨论的那些具体难题，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却沉淀了足以让后人体会应该怎样去处理难题、总结经验的启示。

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中出现一些难题，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同而看法不一，这是很寻常的事。寻找解决办法，自然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统一思想，切忌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要鼓励人们讲真话，不怕有分歧。只要是符合实际的讨论，即使改变原定会议主题也无不可。只要充分发扬民主，就能“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就能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地摆出来，深入下去进行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只是抽象地泛泛而谈，只讲原则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体上如何，而涉及具体问题则语焉不详，这样即使总结出一些共性的所谓经验来，虽然不错，但不鲜明；虽然可能皆大欢喜，但很可能不痛不痒或浅尝辄止，最终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须落实到提出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并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这样，总结经验才算是真正地全面地收到了实效。历史事实说明，“七千人大会”前后制定的各行各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工作条例，以及大会结束后对极度失衡的国民经济进行的有效调整，为扭转我国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早在1948年纠正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偏向时，毛泽东就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致不致重犯。”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我们不断总结和运用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以上算是我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一点体会。

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书，当然会见仁见智。对读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启发，是其应有的效果。作者邀我为此新纪念版写一序言，可能长了些，但还是坚持完整写下一个方面的体会，也算是表达对严肃的有史识有材料的党史著述应有的尊重。

目 录

CONTENTS

代序 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陈晋）	001
01. 前言	001
02.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007
03.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025
04.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	037
05.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051
06.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061
07.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069
08.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107
09.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和说明	131
10.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	143
11.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	159
12. 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173
13.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181
14.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199
15. 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	217
16. 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	229
17.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	241
18.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253
19.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	263
20. 有关大会的成果	289

目 录

CONTENTS

21.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297
22.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313
23.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325
附录	
袁宝华：有关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338
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	348
赵家梁：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353
李瑞山：湖南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357
张文奇：有关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和后勤工作	360
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369
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	379
明 朗：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383
李保文：一位老县长回忆七千人大会	387
刘新起：我在县长任上参加七千人大会	396
李曦沐：亲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399
黄 峥：王光美谈七千人大会的有关情况	403
杨尚昆：七千人大会前后日记摘选	407
七千人大会日志	423
后记	433
编辑说明	435

01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

前 言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我酝酿了很久，看了不少材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七千人大会距今已经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四十多年前人们关注的很多事情，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四十多年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着急、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那时候，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都极其紧张。再有几天就要断粮了！这样的报告不断地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急得周恩来寝食难安。堂堂一个大国总理，其主要精力应是考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但是当时的总理，每次找人谈话，几乎谈的都是粮食问题，被人送了一个苦涩的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更是火上房一般的着急，急得他给各省市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

如今的粮食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人们不但已经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懂什么粗粮细粮了），而且还要讲究粗细搭配，讲究营养，讲究饮食结构。曾经长期因为粮食不足而愁苦的中国人，一下子温饱不愁了，吃不上饭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历史，渐渐地远去了。这恐怕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李先念说：据我看，粮食就是长期不大那么够。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哪一天一颗粮食也不需要进口了，我们这个共产党就算是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化了。^①

如今，中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达到了小康水平。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5年10月12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那时候，棉花极缺，每人每年几尺布，人们穿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如今，我们不但满足了13亿人的穿衣问题，还成了纺织品最大出口国。我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府的严重关注，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时候，中央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但是缺少煤。煤就像工业的“粮食”，没有煤一切都无从谈起，发不了电，采不了矿，炼不了钢。有了煤呢，又很难运出来，因为公路、铁路跟不上，运输的车辆也跟不上。如今我们的采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大量的煤正在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

那时候，把炼钢看作是头等大事。钢铁就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我们能干什么？毛泽东说：“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为了告别农业社会，为了实现工业化，人们的注意力盯在了炼钢上。只有钢的产量上去了，我们的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的人们为了找铁炼钢，把全国的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不少人甚至捐出了自家的锅。尽管如此，钢的产量很难超过1000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土钢，根本不能用，为此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而今日的中国，钢的产量高达3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早已实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梦想。

那时候中央开会，讨论的就是今年能生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生产多少万担，能完成多少万吨钢的任务、多少亿吨煤的指标等等。今天的中央开会，经常讨论的则是如何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使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如何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的是产品，要啥没啥，仓库几乎是空的。而今日的中国，是买方市场，要啥有啥，怕的是你不买东西！

要啥没啥，那就是中国的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奋斗在那个年代。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甚至鲜血，来探索、建设着中国。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带来的是喜悦和辉煌；失误，带来的则是苦难与悲伤。成功和失误，他们是一对双生子，结伴而行，其中又有多少酸甜苦辣。

今天，当我们翻开4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有痛心疾首，也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更有许多感慨在心中回荡。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谁能保证过去的错误，今天不再重复；又有

谁能保证我们果真继承了过去一切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大跃进”运动，试图用几年时间就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而发生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个大会是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为使人们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一个大会，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大会，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从会议本身的情况来看，它有着许多的特点：

会议规模迄今为止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7000多人，前后持续28天；

它是中央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

它是让大家发牢骚、提意见、“出气”的大会；

它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大会；

它也是中共领袖在认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悄然产生分歧的一个大会；

它还是一个复杂的、至今仍有争议的大会。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深入地梳理，细致地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时人们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

“这个会开得好。”（当时的毛泽东语）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①

注释

①《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78页。

②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9日。张劲夫，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③毛泽东同李雪峰等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修订本）下卷，第1062页。

“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②

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要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③这里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了。

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④

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除了对大会的积极评价，也有学者指出：大会仍然在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指导思想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大会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与刘少奇等人由思想分歧走上对立的重要关节，这次会议是后来历史悲剧的发端、是“文革”的起因等等。

我想仅从这些角度，便足够我们重视、研究和介绍七千人大会了。

总起来看，对七千人大会肯定多于批评。在肯定中有批评，在批评中有肯定。

我以为除前面谈到的七千人大会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提出。

我的看法是：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七千人大会则是对3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从大会进行的情况来看，都是思想比较活跃，气氛比较民主。会上，新的想法、新的动议不断产生，许多中央领导的讲话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而是即席发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思想更解放，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更深刻、更彻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这次会议对

党的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更深远。七千人大会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进行总结的，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就很难彻底。尽管如此，七千人大会还是突破了不少框框，与会者几乎是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很多问题，讲了很多平时不敢讲的话，会后出现了思想解放，全方位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遗憾的是，也就是因为七千人大会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否定，所以半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又重新转向，遭受曲折。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深入观察七千人大会前后左右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次大会的前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它的后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至今还有许多的地方值得认真发掘材料，进行理性的梳理与研究。

006

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已经作古，即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这大概也就是多少年来，很少有人详细介绍、展现七千人大会的原故吧！

尽管如此，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当然，我所追求的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而已。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带出个人的情感，尽管他们力求客观，但还是会受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或许您并不满意我的叙述与观点，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相互讨论，听取批评意见，更大限度地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张素华

2005年4月于北京